

緒論

在過去二十年來，身體社會理論對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造成深遠的影響。身體最初是學術界不感興趣的主題，如今卻具有相當的學術重要性，以致於任何研究都不敢自稱無所不包，除非它至少有稍微討論到身體能動性(agency)的先決條件與社會結構所引發的身體效應。社會學中有關身體化(embodiment)的論述，普遍見於一般理論的著作及次領域的研究專著。更確切地說，身體研究的主題不是脫離身體的心智(超脫感官或不受習慣影響)，而是對各種身體的思索與感受，這項認知已經成為社會學想像的中心。儘管身體研究已有這些進展，但大多數的當代社會論述仍未闡明身體的地位、生產力以及對結構力量的接受度，這些概念仍舊晦澀難解，這點頗令人沮喪。

在此背景下，本書期望對身體研究作出理論與實質的貢獻，甚至能更廣泛對社會理論以及社會學研究有所助益，同時設法解決該領域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下文希望達到下列目標：(1)說明身體化在社會理論中難以捉摸的本質。(2)推薦一些經典的社會學著作，它們都關注以下這個迄今仍被忽略的觀點：將身體視為組成社會的多面向媒介。(3)以批判的角度檢視近年

來有關身體的研究取徑。(4)採用一系列的實質身體分析，探討身體與經濟、文化、社交性及科技的關係。上述四項目標相互關聯，尤其是社會學經典的交集點(我將其視為一種身體實在論)，它可以提供我們一個研究架構，藉以降低我們定義身體的困難度，並克服新近研究方法的一些理論侷限。該架構亦能讓我們探究「身體化主體的從屬地位」這個受到強烈關注的課題，而這些新近的研究方法正是以「身體化主體的從屬地位」作為特徵。本章打算更詳盡探討身體在社會理論中的謎樣本質，接著再勾勒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架構，並介紹本書其它部份的主題。

壹、謎樣身體的興起

為了說明身體在現代思潮中，無所不在卻又捉摸不定的本質，首先，本書欲檢視身體主題如何開始在學界日益風行，又為何當我們問及「何謂身體？」時，熱潮卻冷卻下來。身體主題的熱潮，應回溯至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然而，學術界對身體的研究興趣，起初是由社會潮流與某些分析所引發的，當時有些分析提升了身體對其他重要學術議題的重要性。幾派社會思潮與分析觀點連袂助長了早期身體研究的興起，在此必須重新回顧並重新檢視其中最為重要的社會思潮與分析觀點，這將有助於解釋身體化如何成為一個無所不在，卻又讓人爭執不休、無從掌握的主題。身體重要性的提升，代表身體研究領域目前已邁入離心階段，各種五花八門的議題都能與之牽扯上關係。此一現象與近年來的向心趨勢背道而馳(向心趨勢意指幾個不同的觀點成為檢視身體化的主要資源)，這點將於本章末段加

以分析。儘管如此，離心式的研究階段並未完全消退，反而仍持續影響這個領域的發展。

首先，消費文化分析者指出，商業化的身體逐漸成為人們身份認同意識的中心，此一轉變與二十世紀下半葉，高度資本化社會的相應結構變遷有關。二十世紀下半葉，原本要求人們在生產領域辛勤工作，在消費領域克勤克儉；之後卻轉而鼓勵人們辛勤工作之餘，也應痛快享樂的文化精神(Featherstone, 1982)。身體成為廣告文化中無所不在的符碼，主打休閒娛樂的產品充盈各處，就在兩者的推波助瀾之下，助長人們對外貌與身體控制的重視，並將其等同於超高效能的「自我展演」(performing self)。

消費文化理論家藉由特尼斯(Tonnies)對禮俗社會(Gemeinschaft)與法理社會(Gesellschaft)的區分，以及涂爾幹(Durkheim)對機械連帶與有機連帶(mechanical/organic solidarity)的分野等相關視角，進而分析這些發展。以福克(Pasi Falk, 1994: 12-13, 36)為例，他主張現代晚期的自我界線已經脫離集體身體儀式的桎梏，並強調個人化的消費行為，乃聚焦於「身體表面及其感官孔穴(sensory openings)」；這項發展顯然與消費主義大行其道有關。前現代的身體是由集體決定，現代晚期的身體則是個人化的。這兩個時期的身體觀差異，也構成紀登斯(Giddens, 1991)與透納(Turner, 1984)研究的基礎，他們兩人分別以不同的方式，關注消費文化發展的社會政治背景。他們指出，身體逐漸被「展示」為消費的載體，社會地位也與可見的身體自我外表相互連結。基督教歷來都將人體視為罪惡的載體；新興的地誌學方法則認為「肉身即外表」，此一觀點可謂掏空了基督教的身體觀，進而將身體宣傳成一種物質資本(Bourdieu, 1978)。

促使身體研究蓬勃多樣發展的第二種觀點，即為「第二波」

- 3 女性主義的興起。一九六〇年代以降，女性主義者對生物性別/文化性別之分提出批判質疑，藉此強調人們總是拿女性的肉體性(corporeality)合理化女性在公領域的從屬地位，而女性的肉體性絕非天生(Oakley, 1972)。舉例來說，他們認為不論是月經或是懷孕，都不能構成女性在教育與政治領域遭受歧視的合理基礎。職是之故，女性主義研究所揭露的是具有生理性徵的身體，這種身體應該只能發揮微乎其微的社會影響力，但是在過去的父權社會中，卻被用來決定女性的生活機會。

女性主義作品強調，身體在過去如何被當成一種歧視女性的工具。然而，由於身體相關的書寫史儼然形成一股「男流」(male stream)，所以女性主義者原本不打算把身體置於社會思潮的中心。傳統上，哲學家一提及男性便會聯想到自由與心智，一提到女性則聯想到「非理性與身體的連結」(Grosz, 1994:4)。人們以往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具生物性、更富肉體性、更為自然」，因此較適合「私」領域，而非「公」領域(ibid.)。儘管上述的身體化觀點充滿矛盾，女性主義仍對這股身體研究熱潮貢獻良多。艾森斯坦(Eisenstein, 1988)與威廉斯(W. Williams, 1997)從法律的角度，追溯女性身體作為男性財產的歷史淵源；麥金儂(Mackinnon, 1989)則突顯出，我們社會如何透過建構「強制性的異性戀體制」(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形成以身體為基礎的女性壓迫；艾瑞葛萊(Irigaray, 1988 [1977])和克莉絲蒂娃(Kristeva, 1989)考察女性性慾特質在男性文化中如何被邊緣化或被「抹煞」。目前女性主義者已將「重新探究與檢視女性肉體性的概念」這項計畫納入討論範疇(Grosz, 1994: 14)，並根據性慾特質、倫理學與立場知識論(standpoint epistemologies)，對身體提出質疑(例如 Haraway, 1994 [1985])，此外，還將女性身體當作「流體」(fluidity)，建構出充滿想像的

形而上觀念。女性主義意圖突顯出具有各種性慾特質的身體，不過，認為身體化能賦予人類某些共通能力或脆弱性的觀點，則逐漸消失於女性主義的討論中。

第三個引發身體研究熱潮的因素，牽涉到人們逐漸發現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模式的改變，這些改變強調的是人類身體，使人類淪為各種控制形式的客體。傅柯(Foucault, 1970, 1979a, 1979b)的分析在此發揮重要作用，他指出現代性對「人」的建構，如何伴隨著治理論述目標的移轉(智身取代肉身，成為焦點所在)、論述對象的轉移(對生命建構的熱忱取代對死亡的關注)、以及論述範圍的移轉(對各類人口的管理取代對無名個體的控制)。十八世紀見證了性慾特質論述的遽增，例如，將隸屬個人身體的性(sex)與國家的人口治理聯繫在一起(Foucault, 1981)；相形之下，二十世紀的主要特徵則在於，從負面的身體壓迫形式，持續轉移到正面的規勸形式，鼓勵身體化主體以獨特的方式建構自己的生命。

這種對治理性的重視，勾勒出一套受制於制度規範而處於相對被動且無明顯特徵的身體。它突顯出容納身體的空間、限制身體的規則、以及透過身體進行操縱的力量。舉例而言，教學醫院曾在醫療規範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它也讓特殊的患病身體接受不同的治療(Armstrong, 1983, 1995)。這種對肉體性的特殊關注，也突顯了當代政府在處置大量身體時所面臨的難題。如今，全世界的政府所統管的人數，比一千年前多了數百萬。西方的嬰兒死亡率下降、平均壽命增長、醫學發展一日千里，以及愛滋病等疾病的持續攀升(因而需要長期治療)，各種因素匯總起來，導致身體管理的相關成本急遽上升。簡言之，治理性的議題促使學界重視身體研究，但從他們手中復甦的身體，卻被物化為統計數字、問題或控制目標。當身體

侵犯到政府運作時，它便顯得格外重要，但是當身體處於權力節點與網絡之外，在生活中存活、感受與參與時，它就逐漸消逝。

導致人們對身體「現實」產生一種不確定感的科技進步，是勾勒身體議題的第四個分析重點。器官移植、試管嬰兒、基因工程等領域的進展，增強人們對身體的控制，卻也模糊了身體與機器的界線，導致某些人試圖重新概念化人類，建議將人類看成賽伯格(cyborg)。這些類似的發展讓人陷入極端懷疑的深淵，並撼動我們對身體化主體的認識。啟蒙時代思想所接受的個體性原則，就是要找出任何時空背景下個人所特有的事物；然而身體潛在的可塑性卻對這種恆定性構成威脅。舉例而言，人類基因體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預示了新時代的開端，理論上，身體化的各個面向皆能自由變動，而如今(在本書撰寫期間)外科醫師幾乎能完全掌握臉部移植手術的技術(進一步動搖所有固定可見的自我概念)。在此背景下，無怪乎後現代主義作品已揚棄現代主義「認識」身體的計畫。對後現代主義者而言，身體儼然成為「空白螢幕」或「符號接收系統」，總是開放給社會力量對其進行(再)建構，且身體自身完全無法控制(Kroker and Kroker, 1988)。此外，德勒茲與瓜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的作品已將身體轉化為捉摸不定的「無器官身體」(Goodchild, 1996)。主體「去中心化」，顯然業已成功。

科技進步促使分析家聚焦於「不確定的身體」，但這不必然導致後現代對「賽伯格」或「消失中的身體」的重視。有些人不樂見這些企圖抹煞身體化主體之真實性的作法，於是就科技發展的美學與感官效果來分析各種科技發展。例如，他們指出，雖然科技發展會動搖我們對身體的認識，但是不代表身體會因此「瓦解」。反之，我們只是在心理上喪失「基本信任」(basic trust)或「本體論上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Berger, 1990

[1967] ; Giddens, 1991: 45-7]。或者在這個世俗(profane)已成為陳腐事物的現代社會中，所謂身體的不穩定性，已經與現代社會中神聖(sacred)歡騰經驗的復甦產生連結(Mellor and Shilling, 1997)。藉著將「不確定的身體」置於此種社會與身體的變數(parameters)之中，這些書寫將後現代研究的相對主義宣言予以相對化。身體或許變得更具可塑性，然而，真正受到動搖的是我們對於身體的感覺，而非身體自身的物質性。

第五個分析重點不但持續強化身體相關研究的熱潮，更將身體研究與其他學術議題結合。部分學界人士將身體議題視為概念資源，俾能助其發展他們自身的學科。以社會學為例，理論家利用身體概念，來避免過度社會化的個體概念。這種個體概念與派深思(Parsons, 1991 [1951]:541-2, 547, 8)所強調的價值有關(他僅將身體視為行動系統中的次系統)，亦與理性選擇理論不切實際的假設相關(主張行動者在付諸行動之前，會在認知上設立目標，並主張身體是耐用的行動工具，不受體型孱弱、機率與經驗之影響)。「創造力」(Joas, 1996)、「人類」(Archer, 1995)與「身體化互動秩序」(Shilling, 1999)等概念，已試圖對身體化本身進行理解，這些對身體化的理解不會淪為任何單面向的社會行動觀或結構決定論的社會分析。上述例子指出，身體是社會現實的一部分，卻被人們所忽略，其內涵(capacities)對學科分析來說十分重要。

一九八〇年代以降，上述五種社會思潮與分析重點，大幅推動並維持身體研究的熱潮。然而，人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人們對該主題的定義，卻多所不同。對消費文化理論家來說，身體是種表面現象，它變成可塑的商業價值標誌，受到時尚的奇思遐想所型塑。女性主義者認為，身體是一種性別化的客體，被用來合理化女性的從屬地位。對傅柯式的治理性分析

家來說，身體是客體，過去一直因為不時改變的控制模式，而淪為被動者。對於那些有興趣融合肉身與機器的人來說(同時伴隨著賽伯格的發展)，身體已經成為一種不確定的，甚至是急遽消失的前科技文化殘餘物。最後，對於那些試圖在自身專業領域內部解決理論問題的人來說，身體已經變成一種實證概念範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種分析僅著重身體的某些層面，卻忽略了身體的其他層面。

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①，已有不少研究關注於這些不同的

①：除了部分學者試圖建構一個身體研究領域(例如 Turner, 1984; Frank, 1991; Synnott, 1993; Shilling, 1993)，出版品也突顯出文化與生物性互動所導致的社會與醫學影響，(例如 Hirst and Woolley, 1982; Freund, 1982; Turner, 1991a; Wilkinson, 1996, 2000; Elstad, 1998; Newton, 2003a, 2003b; Williams *et al.*, 2003; Williams, 2003a, 2003b)，身體化的結構面、溝通面、政治面和詮釋面(例如 Johnson, 1983; O'Neill, 1985)，以及當代身體化形式的系譜(Feher *et al.*, 1989; Laqueur, 1990; Sennett, 1994; Sawday, 1995; Hillman and Mazzio, 1997; Mellor and Shilling, 1997)。此外，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作品，檢視了男女身體化模式周邊的權力關係，而理論家嘗試建構一種新的身體倫理(例如 Butler, 1990, 1993; Diprose, 1994; Grosz, 1994; Frank, 1995; Kirby, 1997; Shildrick, 2002)。其他學者則研究情感的身體性與感官(例如 Scarry, 1985; Howes, 1991; Classen, 1993; Bendelow and Williams, 1998; Burkitt, 1999; Craib, 1997; Shilling, 2002)，並嚴正質疑傳統西方對身心關係的理解(Burkitt, 1991, 1999, 2002; Crossley, 2001)。也有不少著述，提及老化、男性特質、女性特質與身體之間的關係(Davis, 1995; Featherstone and Wernick, 1995; Connell, 1995; Peterson, 1997; Watson, 2000)，健康、疾病、傷殘、生殖遺傳學與身體之間的關係(例如 Turner, 1995; Freund and McGuire, 1991; Peterson and Bunton, 2001; Seymour, 1998; Ettore, 2002)，身體主體「活生生的經驗」(例如 Young, 1980, 1998; Crossley, 1995, 2001; Wacquant, 1995; Nettleton and Watson, 1998; Ahmed and Stacey, 2001)。其他作品考察身體的醫療管理(Martin, 1987, 1994)，身體化的文化地理(例如 Rodaway, 1994; Ainley, 2001; Bale and Philo, 1998; Nast and Pile, 1998)，社群與宗教的身體基礎(例如 Bynum, 1987; Brown, 1988; Mellor and Shilling, 1994; Coakley, 1997)，後殖民身體(Ahmed, 2000; Holliday and Hassard, 2001)，以及哲學的身體化(例如 Burkitt, 1999; Lakoff and Johnson, 1999)。生化科技對自我認同的影響，也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例如 Haraway, 1994 [1985]; Heim, 1992; Kimbrell, 1993; Featherstone and Burrows, 1995)。

分析重點。單就作品量而言，就足以證實這個新興研究領域的健全發展。身體相關研究挑戰了此一觀點：「社會操縱人類的智識與共識，而非直接操縱人類的身軀」(O'Neill, 1985: 48)，同時身體相關研究也確立了幾門次學科的研究領域，並且對社會與文化理論產生廣泛的貢獻。儘管如此，「身體」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仍舊是最具爭議的概念之一：身體分析開闢一個戰場，讓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現象學、女性主義、社會生物學、社會學及文化研究在此廝殺競逐(例如 Howson and Inglis, 2001)。由於各派的研究議題彼此衝突，加上身體研究極為多樣，致使身體化的各個面向都被突顯出來，而其他面向則淡化為背景。這導致身體從我們的視野中消退、流逝，且在經歷一連串的變形過程後，身體的面貌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輪迴，變得難以辨認。誠然，在所有的肉體社會學研究中，其焦點時而強調結構與規範，時而強調這些現象的圍限與形塑潛力。由是觀之，在這類分析的某些部分中，我們應當預期身體會發生一種暫時且合理的「褪逝」；不過，這種「褪逝」不同於身體的整體消亡，也不同於身體生產力的消亡，雖然許多身體研究都有這些錯誤見解。更普遍的是，對許多人而言，身體似乎變成只是一種隱喻，唯有透過這種隱喻才能尋求獨特關懷。在此脈絡下，我們愈來愈難界定身體，更別說指出身體領域的研究內容。我舉兩個最著名的身體研究為例。透納(Bryan Turner, 1984: 8)總結道：身體或許看似結實，實際上卻是「最難以捉摸、虛無飄渺、隱晦難解、又永遠遙不可及的事物」；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93:ix)則承認「在企圖思考身體的物質性時」，她「總會偏離主題」。

無法充分決定(under-determined)的身體

欲說明身體無所不在卻又難以捉摸的特質，我們必須瞭解，這些形形色色的學術計畫可能以什麼方式，激發人們對身體研究的興趣，我們又能如何利用這些眾多方法來定義身體。至於我們為何有必要這麼作，主要是因為身體尚未成為西方思想中之強大正向概念化的對象(positive conceptual appropriation)。長久以來，哲學大多賦予身體大量的負面內容，有鑑於此，當代作家便有極大的揮灑空間，從理論上為身體挹注豐富而積極正面的意義。

西方思想普遍對肉體抱持負面態度，箇中緣由可上溯至古希臘。希臘字「索瑪」(*Soma*)原指屍體，後來用指「身體」。蘇格拉底辯稱，持續的快樂並非來自(終將腐朽的)身體，而是來自(不朽的)靈魂；這項區隔後來又與「非理性的熱情」/「理性的思維」之分聯繫起來(Snell, 1960 [1948])。大體而言，希臘倫理觀認為，靈魂的渴望應受一種名為「健康思想」(healthy thinking)的自我控制所引導，「健康思想」本身又與身體本能和情感所必然導致的「苦痛」相對立。此種哲學研究方法將身體的重要性加以邊緣化，主張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擁有心智。雖然存在著這些對身體的詆毀，但仍不乏某些別具意義的例外觀點。不過，在導致現代世界到來的重大事件發生期間，對身體的負面看法依然受到進一步的強化。在這一點上，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宗教戰爭導致一個特殊的局面。現代哲學的支持者必須面臨政治上的不容異說，神學家彼此之間的敵對意識與獨斷主張，以及一種習慣將身體與非理性、罪

惡連結在一起的身體觀。在此脈絡下，「對確定性的渴求」(Quest for Certainty)在哲學家之間逐漸蔚為潮流，哲學家希望循此途徑建立無所不在、普世且超越時間的真理，該真理不受人體傾向與情緒的奇思遐想所影響(Toulmin, 1990)。此種對確定性的渴求奠基於理性而公正的心智力量，並以笛卡兒作為代表。笛卡兒主張人性的本質在於我們(高貴)的思考能力，而我們的身體則將(卑賤)的情緒加諸於我們之上(Toulmin, 1990: 134-5)。基於對感官的不信任，笛卡爾辯稱「吾乃唯一會思考之物，吾之心智全然且徹底異於吾身，心不需身，亦可存焉」(Descartes, 1974: 105, 156)。霍布斯(Hobbes)反對笛卡兒的許多構想，並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哲學觀，霍布斯的哲學以身體作為基礎，並圍繞著秩序問題(亦即人類如何生活在一起，社會生活又不致淪為暴力)。然而，即便是霍布斯的哲學，身體仍舊被視為一種牽絆，迫使人們採取自我擴張的行動，最終將導致人人相互對抗的戰爭。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並未改善這些對身體的負面觀點，儘管啟蒙時期的思想十分多元，但是當時的主流思潮往往將個人看成對自身行為具有理性判斷與認知能力的主人(Cassirer, 1951; Hamilton, 1992)。舉例而言，與啟蒙運動有關且最負盛名的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964 [1785])，他並不認為身體與慾望能夠作為行動動機，也不認為善的標準是根植於人的自然秉性。反之，康德(1985 [1797]: 56)主張人類乃理性的存在，欲達致「善」，個人需超脫自然並恪守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我已指出，儘管貶抑身體者眾，但在此陣容中不乏例外，除了霍布斯之外，諸如德梅斯特(De Maistre)、費爾巴哈(F Feuerbach)、尼采(Nietzsche)、胡賽爾(Husserl)等，以及社會學領域的馬克思(Marx)、涂爾幹(Durkheim)、韋伯(Weber)等輩，這些思想大師對身體相關書寫的「祕史」(hidden history)貢獻良多，

並深獲認同(Turner, 1991a; Shilling, 1993)。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兩股與身體主題相關的潮流，宰制了身體相關書寫的歷史，這兩大潮流終究無法在理論上鞏固各種人類身體化的建設性觀點。

- 8 一方面，儘管越來越多的思想家認為，身體在創造社會生活上扮演著積極角色，但是認同此觀點者仍屬小眾。在分析「身體技術」時，牟斯(Marcel Mauss, 1973 [1934])考察的是構成人類能動性的身體基礎，其分析指出社會過程為何有助於建構人類身體存有的最深處(recesses)。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62)的現象學提到，身體使我們能夠「向世界開放」，並作為「存在世間的媒介」以及「與世界溝通的橋樑」。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63)關注於「身體習語的共同語彙」，指出身體外表與身體管理，對社會自我建構及社會互動維持而言至關重要。然而，這些研究十分多元，產量又相對稀少，代表身體的正面概念意義仍無法充分決定。

另一方面，由於受到派深思(Talcott Parsons)研究的影響，身體這種無法充分決定的屬性，在社會學內部被進一步強化。派深思可謂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詮釋家，但總體而言，他對社會學的看法壓抑了且邊緣化了身體在先前社會學理論中的重要性。他對社會學的見解，將霍布斯當成負面的指示對象，尤其是霍布斯用來解決秩序問題的「功利主義」。派深思(Parsons, 1968 [1937])駁斥霍布斯有關社會行動動機的分析，並針對秩序問題發展出一套不同的規範性解決途徑。重要的是，他指出社會學有一套前後一致的傳統，該傳統以一種更為實際的關切(關注共同價值的整合)，取代霍布斯對身體激情的關注。舉例而言，派深思重新詮釋了涂爾幹有關身體集體歡愉(bodily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論述，認為這是在探討共同價值與規範性整合(normative integration)。派深思故意一舉模

糊身體對古典社會學的重要性。

對我們來說，上述背景的重要之處，在於能讓當代理論家更易於賦予「身體」極度多樣且豐富的能力，相形之下，強烈實證理論傳統之下過度確定的概念，反而不易賦予身體同等的能力。誠如我們所見，自一九八〇年代以降，開始掀起身體研究的熱潮，各種學術議題各自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對身體加以定義，並賦予身體互不相容的角色。身體被當成「空白螢幕」(有許多文化意義「書寫」於其上)；認同的建構者；或是標誌著無法化簡的差異；治理性微觀權力的接收者；或是作為克服身／心、文化／自然等「二元對立」的媒介(傳統社會思想以這些二元對立作為特徵)；所有經驗的具體安身之處。我們很快就會明瞭，對不同的人而言，身體帶有不同的意涵。雖然身體的可塑性讓它在學術思想中蔚為風潮，但也導致身體難以捉摸。何謂身體，或者該如何分析身體，這些問題似乎尚未達成共識。

貳、古典基礎

9

如果想瞭解身體議題在當代社會思潮中，為何無所不在卻又難以捉摸，無法充分決定的身體概念顯然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若我們想確立對身體內涵的理解(這是讓身體理論有所進展的必要之舉)，那麼，解除派深思對身體的壓抑，定能有所斬獲。在此脈絡下，本書第二個目標，乃企圖恢復身體在社會學的核心地位。然而，光是回顧身體相關的社會學研究，並無法達成這個目的，所以我不打算簡述每位古典理論家的身體論述，畢竟前人已經做過相同的事，結果還是無法理解，身體為何構成社會學傳統之下許多重要概念與研究的基礎。反之，

我企圖彰顯古典名家在分析身體時的趨同現象，這點迄今仍為人所忽略。

派深思(Parsons, 1968 [1937])乃社會學趨同理論的重要代表。他將焦點置於社會行動，並指出各種社會學研究都基於一種非功利主義且「自願的行動理論」(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派深思的研究因為詮釋不夠精確，而持續遭受批判(雖有點不盡公允)，且多半被拒斥為身體研究的有用資源。然而，當代身體化的研究熱潮卻忽略一種可能性——部分古典理論家的趨同現象或許不盡然如派深思所稱，是落在他們的行動論述上，而是落在他們如何確立一個既創造社會又吸納社會力量的身體概念之上^②。馬克思、涂爾幹、齊美爾(Simmel)的理論都有此種趨同現象。為了建立本書所採用的理論架構，我會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三個人的作品上。我選擇這三個人的原因，並非他們對身體研究有出乎意料的補充，而是因為他們提供了道德標準(他們分別關注於剝削與壓迫、個人力量的集體強化、理性化與個別人格發展的影響^③)，我們才能藉此評估身體在當代的定位。

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彼此之間歧異甚鉅，一般人認為他們的研究在理論上互不相容(尤其是因為他們出自於對立的哲學傳統)。不過，我倒認為這種評價有待修正，因為這些理

^②：理文恩(Levine, 2000)的一篇文章談到，近來發現古典社會學家的作品之間具有趨同性，雖然這篇文章不處理身體的議題，但卻顯示出，若能從兩種截然不同的作品中找出契合點與共識，是一件多麼有生產性的作為。

^③：韋伯與齊美爾較量，看看誰才是研究理性化的理論家，而齊美爾(Simmel, 1990 [1907])對貨幣經濟的分析，自稱是絕無僅有的一部鉅作，剖析了理性化對現代人人格的影響，其實齊美爾所言不假(參見Turner, 1986)。再者，韋伯傾向貶抑情感的與習慣的行動，齊美爾則更加重視身體內容與驅力的社會生產力。

論家都趨於一種身體觀：認為身體化經驗是組成社會的多面向媒介(multi-dimensional medium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涂爾幹的獨到之處在於，他一開始先論述集體性(collectivity)在理論與道德上的首要地位，將其視為由文化建構而成且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現實。接著，涂爾幹留意道德個人主義(moral individualism)興起的可能性，道德個人主義可能為進階資本主義提供合適的架構(Durkheim, 1984 [1893])。同時，涂爾幹也將身體看成集體象徵主義的源頭與接受者，集體象徵主義能夠將個人納入群體的道德生活。同樣地，雖然齊美爾認為，(互動的)個體具有理論與道德上的重要性，但是他的分析卻將身體視為個人秉性的源頭，有助於形成最初的社會形式，而這些社會形式又會激發個人的社會凝聚感(social bonding emotion)(Simmel, 1971 [1908a])。一方面，齊美爾(Simmel, 1990 [1907])說明這些社會形式如何在貨幣經濟之內，匯流成令人窒息的結構，進一步導致犬儒哲學、冷漠與厭煩的態度；另一方面，他也堅持人類生命的物理生機論(physical vitalism)仍然可能超越既有形式(Simmel, 1971 [1918b])。最後，馬克思雖然兼容各種理論傳統的元素，強調社會階級、個人主義競爭市場以及集體解放的可能性三者之間的關係，但他認為身體是各種經濟關係的源頭，並進一步關注資本主義對身體的毀滅性影響(Marx, 1975 [1844]; 1968 [1848])。這些影響能夠將工人「嵌入」(fit)市場上的約束性工作，但也構成階級鬥爭與社會變遷的基礎。

假如我們抽離出這些分析的共通點，藉以彰顯他們的趨同現象，必定能夠從他們的身體觀找出三個雷同要素。首先，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皆指出身體所具備的特質，且認為這些特質是創造社會生活的源頭。這種身體觀將身體視為社會之源，堅決主張我們的身體存在是一種主動且具生產力的現象，

而非完全取決於社會屬性，相形之下，後結構主義則將身體化主體視為「文化的人造品」(Harre, 1983: 20)。廣而推之，這種將身體視為社會之源的觀點，讓我們瞭解到，身體化主體擁有自主能力，它足以影響日常生活事物；同時我們也瞭解到，身體化主體擁有社會創造力，這種能力源自身體感官與移動的屬性，即使個人不一定會直接意識到這些屬性。這種視身體為社會之源的觀念，指出人類基本能力與社會結構之間存有因果關係，但是社會結構的運作，有時並不受意識企圖和主體想法所影響。

第二、在某種程度上，身體也是社會結構特性運作的場域(location)。馬克思強調經濟體的結構特性，涂爾幹著重於文化的結構特性，而齊美爾所關注的「結構」特性則是各種社會形式；然而，三位都考察這些結構如何在主體身上找到棲身之處。他們都承認，社會雖然建立在人的身體化屬性之上，但我們無法以既有的身體化社會成員，對社會進行解釋，而且社會還能「反過來影響」這些身體。一方面社會激發並幫助我們發展某些需求與能力，另一方面又抑制其他需求與能力的發展。● 社會藉由鼓勵某種外貌、習慣與行動，來「掩飾或壓倒我們的意識決定或正式決議」，進而自行沈澱於社會成員的體內。此外，社會還對身體進行分類，劃分出合宜的身體以及偏常的身體(Connerton, 1989:72)。總而言之，身體作為社會運作的場域之一，表示我們必須重視一整套密切相關的觀點，其中包括：11 身體逐漸受到自然法則的影響與限制、身體受到氣質與性情的主導、身體的呈現方式受到監督、身體被積極鼓勵以某些方式行動。一旦認識到身體是這樣的場域之後，社會與身體之間亦存在某種因果關係，儘管這種關係並不具絕對的決定性(身體不會只因為社會結構形塑了身體化主體的部分秉性與外貌，而

喪失所有的創造力)。

第三，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的趨同現象必然包含此一觀點。他們皆承認，身體的生產力(generative capacities)和社會既有結構之間的互動，對於人類潛力與社會環境的後續發展來說，相當重要。身體不僅是社會之源與社會的藏身之處，它還是個人置身於社會、並導向社會的必要工具。當身體化主體用感覺與感官去面對社會生活的結構特質時，身體化主體可能以其獨特的方式附著於所屬環境，或是與所屬環境保持距離。這些反應及其結果，又以種種方式重新塑造身體，或是加強人的潛力，或是將其削弱。於是，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皆就特定層面，關注現代性對於人們身體化特徵的影響。這種置身過程(涉及對社會機制的吸引或拒斥)也是決定社會系統存留或衰退的基礎。

將身體視為社會組成的多面向媒介，這種研究方法在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的作品中，各有不同的發展取徑，其運用的術語亦不相同。馬克思主要討論的是經濟要素的結構特質(包括物質性的/技術性的)；涂爾幹側重文化的結構特徵(包括儀式和象徵性現象)；齊美爾則強調社會結構要素，他稱之為「社會形式」(social forms)(社會形式形構了人際間的互動)。儘管三位的著重點不同，但他們都將身體視為一種源頭、一種場域與一種途徑，唯有透過身體，個人的情緒與形體才能置身於社會並導向社會。源頭、場域與途徑等觀念遂成為「概括的」術語，指涉許多密切相關的概念，但它們的整體意義和相互地位相當清楚：其分別指涉身體的生產特徵、身體的社會接受度，以及身體對於(不同群體的)身體化個人和社會結構特色之互動結果的重要性。

為了進一步釐清這種身體研究取徑的意涵，我們必須探討

- 這個取徑如何奠基於我所謂的身體實在論(corporeal realism)。實在論哲學與科學方法之著作擁有悠久的傳統，該傳統在社會科學界形成一股深具影響力的潮流(儘管雙方有內在的差異)，
- 12 近來巴斯卡(Roy Bhaskar)等人將該傳統發展成各種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實在論相關重要討論的絕佳概述，參見 Keat and Urry, 1982; Sayer, 2000)。這些實在論研究往往會將身體邊緣化，但我們若認真看待實在論的重要原則對身體化分析的意義，將可能闡述身體實在論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徵(趨同理論已經以身體實在論勾勒出身體與社會的關係)^④。接下來，我不打算探討實在論的哲學複雜性，也不在此勾勒實在論對身體分析的所有意涵，而是以最簡要的方式抽離出實在論的核心特徵。這麼作的目的在於，將上述趨同理論的寶貴之處予以形式化並加以延伸，進而為該領域的後續實質研究提供研究架構。

身體實在論

身體實在論(corporeal realism)與其他實在論的不同之處在

^④：本人在此欲勾勒出我所謂身體實在論的基本原則，藉此促進實質性的身體分析，未來我將針對此研究方法提出更為深入詳盡的解釋。就現有的研究來看，與建構身體實在論有關的作品包括阿爾契(Margaret Archer, 2000)的《身為人類》(*Being Humans*)，此書論及此研究方法的最新進展。至於各種發展身體實在論的個別研究方法，可見於班頓(Benton, 1991)、道爾與葛夫(Doyal and Gough, 1991)、索普爾(Soper, 1995)、紐歐(New, 2003)。此種實在論研究方法亦得力於神經學與醫療社會學等領域，這些領域指出，身體實在論這種以更宏觀的視野，考察身體—社會之關係的研究方法，未來將有更大的影響力(如 Sawyer, 2001)。例如，醫療社會學把巴斯卡爾和阿爾契作品，應用到健康、疾病與身體等議題，此舉正發揮強大影響力(例如參見 Wainwright and Forbes, 2000; Scambler and Scambler, 2003; Williams, 2003)。

於，它把身體與社會的關係視為社會學的核心議題。然而，身體實在論仍然奠基於實在論長久以來的觀點：(1)就本體論而言，各種結構力量、制度與角色之間的關係具有分層的特徵，結構力量、制度與角色三者，一方面構成了社會，另一方面構成了居於其中的人群；(2)社會分析需考慮時間要素(納入時間要素，方能分析某段期間內，身體生產力與社會限制之間的互動情況，而不致於將一者化約為另一者)；(3)此種分析法對社會分析而言具有潛在的重要性。下文將就諸點分述之。

首先，身體實在論的核心是一種以本體論分層的世界觀(ontologically stratified view of the world)，主張身體與社會皆為真實的存在，無法消解成論述，並具有互為因果的生成屬性。首先，就社會面進行剖析。身體實在論將身體置於關注的焦點，將社會結構視為呈展(emergent)現象。社會乃由各種經濟階層、官僚組織、法定角色與社會規範所組成，基本上異於身體化主體的慾望與行動。人們無法重新創造其所身處的社會，只能面對既有的結構，「人們始終在一個非其所創，充斥結構性限制與可能性的世界中行動著」(Bhasker, 1998: xvi)。舉例而言，一個國家的語言、人口結構、房屋存量、可用能源、以及道路壅塞程度，在每個新世代到來之前業已存在，並確立身體發展、行動與健康／疾病的參數。正因如此，阿契爾(Margaret Archer, 1955: 135)將社會稱為「令人困擾的事實」，她這種對於社會事實(facticity)的描述，源自於孔德(Comte)和馬克思的觀點。孔德認為行動者大多已死，而馬克思則指稱，歷代的遺業令人們肩負著千斤重擔而行動。社會的現存特徵不僅包含身體化行動發生的結構性條件，亦包括可能影響歷代行為的文化規範與價值。如果我們接受此一假設：人類的本能結構相對薄弱，而且在生物學上，人類和其他動物比較起來，大體算是「未

完成的」動物。便能瞭解人類有何傾向，人類為何需要社會規範與結構才得以生存及興旺(Honneth and Joas, 1988)。這意味著身體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被視為社會結構的棲身之處。

然而，將社會視為一種呈展現象，並非要邊緣化身體化主體在身體社會關係中的重要性。雖然身體是社會既存結構要素的棲身之處，但並不代表身體化主體能夠被簡化為社會，或因此喪失創造性行動的能力。誠如塞爾(Andrew Sayer, 2000: 12)所言，我們仍然「必須認識社會與身體之間的互動」。欲達成這個目標，必需遵照實在論的分層本體論，堅決主張社會與身體化主體皆為呈展現象(Archer, 2000)。因此，相對於社會生物學家(他們將個人簡化為基因物質「賴以生存的機器」(Dawkins, 1976)，或演化心理學家(在他們看來，選擇性措施賦與大腦一種適應生存需要的特殊單元構造，導致我們的行為「被纜線重重包圍」)，身體實在論亦主張將身體化主體視為一種呈展現象、一種具有因果重要性的現象，並因其本身的條件(in its own right)而被視為重要的分析對象^⑤。我們有必要概述此一論點的基礎。

^⑤：演化心裡學乃時下最具影響力的自然主義身體研究方法，其支持者與社會科學家之間引發激烈爭辯。前者錯誤地指出，存在一種「標準社會科學模式」(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它摒棄社會學的解釋，認為人類心智就是一張白紙，完全任由文化銘刻其模式於其上，而沒有意識到演化的影響；一些反對者似乎認為，我們的任何行為絲毫可能因為受到演化影響，而「被纜線重重包圍」。相關討論的重要著述與概論，包括賽吉史塔爾(Segerstrale, 2000)以及羅斯與羅斯(Rose and Rose, 2000)所編輯的作品。然而近年來，社會學家的作品無論是否涉及肉體社會學研究，皆承認生物學與演進的重要性(例如 Elias, 2000 [1939]; 1991a, 1991b; Hirst and Woolley, 1982; Freund, 1982; Benton, 1991; Shilling, 1993; Birke, 1999; Burkitt, 1999)，這些作品至少會將這些議題納入社會學中。威廉斯(Williams)、伯克(Birke)、與班狄羅新(Bendelow)三人於二〇〇三年的社會學合集《論生物學》(*Debating Biology*)中便反映這點。

將身體視為一種社會生成的呈展現象，是身體實在論得以站得住腳的關鍵。身體實在論承認人體由各種特殊元件(基因、血液與骨骼等)組合而成，也主張人類行動不能被化約為上述元件，畢竟身體化主體不但擁有身體範疇與新陳代謝網，它還有情感、秉性以及某種身體化意識，這三者透過有機體的演化與發展過程，逐漸顯現出來，讓人得以介入周遭環境、影響環境並行使其能動性(agency)(Capra, 2002)。達爾文也將整個身體有機體，視為一個演化競爭的基本單位。這種身體化主體的概念與認知面的個人概念形成對比，後者著重於理性心智，排除感性身體；前者則欲突顯基礎的(有時是前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身體存在狀態與秉性〔我們從演化過程中獲得這些秉性，它們僅於人類存在的長時段(longue duree)作微幅改變；Braudel, 1973〕〕，如何成為某些結構的永久源頭。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雖然無緣見到當代的生物學研究與演化思想，他們卻都認定身體是一種呈展現象，對社會生產而言相當重要。他們相信身體的基礎構造以及人類的生理特質賦予我們需求與能力，藉此，我們能以某些方式參與並影響周遭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他們也相信，投身於這些活動所習得的身體秉性與習慣，是現存社會結構得以運作的關鍵。這意味著，結構與人類身體化條件之間的關係密切與否，可能影響特定結構的建立與維持。所有已知的人類社會，不論存在的時間長短，都會產生一些工作與社交模式、工具與技術、遊戲或運動儀式，以及音樂等，這一切絕非偶然。儘管形式迥異，但這些結構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們在身體需求與能力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稍後我將探討，結構的存在與維持，必然與人類的身體化能力有關。如此一來，我們不僅必須將身體看成社會的棲身之處，還要將其視為社

會生成之源^⑥。

因此，身體實在論的第一要素，乃此一概念：當我們在處理身體與社會的關係時，我們所探討的是呈展現象與因果現象。結構與身體化主體不盡相同：舉例而言，結構通常在社會角色、法律規範與物質加工品中成形，且結構的未來取決於人的行動，但結構與人極為不同(Bhaskar, 1989: 35; Archer, 1998:200)。身體—社會關係理論不應單就社會建構來說明身體，或是單就身體結構來解釋社會。因為結構具有呈展性，所以光提到生存個體(如理性選擇論)的行動，就對結構予以分析或解釋，是無法令人滿意的；同樣地，單憑結構(如結構主義)來解釋個體的信念與行動，亦讓人無法苟同。

至於身體實在論的第二與第三要素，我們簡述帶過即可。第二要素指出，為了避免在分析時混淆不同的現象，身體實在論必須將時間要素(temporal component)納入社會分析(Archer, 1988, 1995)。換言之，假如我們想瞭解身體化行動者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就必須多方考量，不能只囿限於：(1)辨別身體與社會結構生成之間有何關係，並沿著時間進行追溯；(2)既定結構如何形成身體化行動的背景，以及結構為何能影響人類的身體行動與習慣；(3)身體化主體的生產力，事實上如何與這些結構產生互動，如何對這些結構進行再製或轉移(並從而建立起下一代發展身體、感覺與行動的環境)。雖然目前的身體研究，可能限制了我們再製時間整體向度的能力，但身體實在論對身

^⑥：身體實在論不必然會斷言，每個人身體都一模一樣，而是要求我們承認，同樣具有身體化屬性的人類，會共享某種身體力量以及社會生產力。我在此要簡短強調，身體實在論並不排除「身體化潛能受社會所影響」的想法。身體實在論還建議我們，身體與社會關係的概念必然取決於生物本質論與社會建構論，這種觀點或許失之過簡、失之無用(Shilling, 1993, 2003; Sayer, 2000)。

體相關研究的質問，卻容易體認到身體論述所觸及的時間要素，從而評價這些論述。

第三，我想指出身體實在論不僅可以、也應該帶有批判性。在這一點上，近來巴斯卡爾在特定的批判實在論上頗有斬獲，他的研究一直想評估認知真理，並企圖揭露在哪些體制與情況下，可能會引發謬誤觀點，或可能會削弱個人參與溝通以及追求真理的能力(Bhaskar, 1989)。然而，像巴斯卡提出的這種判準，仍然不夠關注身體。舉例來說，紐歐(Caroline New, 2003:60)指出，「我們關注健康，不只是因為它有助於論述而是因為，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健康與其他良善(goods)關乎於人類昌隆；健康有助於各式各樣的能動性，而不只是論述上的溝通能力」。雖然對於何謂人類昌隆，人們難以達成共識，但身體實在論的最低批判標準，則在於避免對身體化主體造成傷害。塞爾(Sayer, 2000)指出：

因為某些行動必然會損害生理與心理能力，就認為這些行動是錯的，這還算合理。舉例而言，我們可以指稱，腦前葉切除術與陰蒂切除術是錯誤的行為，由於這兩者皆切除器官或器官的一部份，剝奪了受害人的重要生物機能，而這些機能有助於人類昌隆與幸福。

總而言之，將身體視為組成社會的多面向媒介，這種方法本身極富肉體性，因為當它關注於社會行動和社會結構時，身體被置於中心位置。社會行動被身體化，而且必須被如此看待；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認為，社會結構的作用，是社會結構對身體化主體進行制約與形塑的結果。這種研究方法也是一種實在論，因為它不但承認(身體化)行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差異

(認為身體有其自身的本體論，無法簡化成社會)，也認為兩者的長期互動狀況值得我們觀察。儘管我在闡釋這種研究方法時，大量運用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的理論，但這並無損此一研究方法所堅持的實在論。雖然馬克思與涂爾幹的詮釋南轅北轍，但是在他們的論述中，呈展與互動的重要地位已經確立下來(Collier, 1998; Creaven, 2000; Sawyer, 2002)。第二章也將談到齊美爾著作的這項特色，儘管大家普遍認為齊美爾屬於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者(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t)。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皆注重社會的結構特質(經濟/科技、文化、社會形式)，並承認它們源自於身體化的創造者，但是這些結構特質卻不能化約成身體化的創造者，而且反過來還會影響它們的身體化創造者。最後，將身體視為組成社會的多面向媒介，此一觀點也頗具批判性，因為它想評估特定社會對人類潛能的影響。不過，當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論及資本主義理性社會對身體化主體的實際作用時，並無趨同的評定結果。馬克思關注經濟體制的社會不公與壓迫，如何阻礙人類身體化潛能的發展。涂爾幹感興趣的是，參與文化社群為何能讓個人超越二重性人性(homo duplex)的利己標竿，成為具有社會強化能力的道德存在。齊美爾的焦點則在於個體性(individuality)與社交性(sociality)的發展，他也強烈意識到社會形式對人格發展的矛盾影響。儘管如此，這些理論家仍然讓我們發現一些重要議題，這些議題有助於我們評估身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⑦。

⑦：涂爾幹的理論強調社群，而齊美爾則著重個體性。假如我們接受涂爾幹的觀點，認同個體性併入集體性就能獲得強化，同時承認齊美爾所說的，過度沉浸於集體性將會淡化主體的個體性，則他們兩人的關切重點就能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抵觸。涂爾幹與齊美爾可能源自不同的出發點，來分析個體—社會關係，但涂爾幹在關於自殺以及勞動分工的研究中，承認當個體的身份認同被集體性所湮沒時，個體會面臨一些問題。

參、主流的身體理論

身體實在論此一研究方法，將身體視為組成社會的多面向媒介，為身體研究帶來相當多的資源。然而，若欲從古典大師的著作中擷取這種資源，則需龐大的重建工作。儘管身體的重要性不容小覷，但是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仍以現代工業社會作為關注焦點。這可以解釋為何身體有時仍會在他們的作品中逐漸消失，甚至毫無蹤影可尋(Shilling, 1993)，同時也能說明派深思為何隱匿身體在他們作品中的地位，以及為何讓身體此一研究目標長期處於休眠狀態。在這樣的脈絡下，本書的第三個目標，將針對晚近最重要的身體研究方法，提供一個批判性的綜述與質問。

談完身體研究熱潮主要的離心趨勢之後，接著討論該領域的向心趨勢。儘管身體研究內部百家爭鳴，仍然有三種理論途徑成為身體研究領域的主要闡釋方法。雖然這三種理論途徑皆未堅守「身體乃組成社會的多面向媒介」之觀點，卻讓身體成為顯著的研究目標，這是前所未見的情況。此外，儘管這種理論途徑之間有重大差異，卻都對於當代身體化主體的命運表達高度關切；這不僅是基於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的關注點，還強化了他們的論點，並確保此一研究方向有進一步的發現。如今，將身體的社會意義予以概念化的方法之中，最具影響力的方法有三：其一，社會建構論對井然有序之身體(ordered body)的分析，其二，以行動與現象學為導向，對活生生的身體(lived-body)進行研究的方法，其三，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中的身體概念。這些研究方法不斷設定新議題，以引領

此領域的相關研究，但終究仍強化了身體難以捉摸的特性。

社會建構論在分析井然有序的身體時，將人類的肉體性視為被政治制度、規範性制度與論述制度予以產製與管理的對象。他們強調身體是社會的棲身之處，這表示唯有透過這種研究方法，我們才能察知社會系統的巨大結構力量。負責發展這個觀點的研究，花了很多心力激發並鞏固社會理論對身體的關注。因此，透納(Bryan Turner, 1984)的結構論專著《身體與社會理論》(*The Body and Society*)，以及後來的後結構論研究，
17 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困擾》(*Gender Trouble*, 1990)與《身體很重要》(*Bodies that Matter*, 1993)，這些作品證實身體的治理性管理是外部環境的關鍵要素；而外部環境就是社會行動發生的場所。在這些研究中，傅柯(Michel Foucault)有顯著的影響力，他認為身體是「事件銘刻的表面」(the inscribed surface of events)，並且「全然為歷史所銘記」(totally imprinted by history)。永遠沒有所謂不可化約的「本質」，能夠定義人們的自我認同或行動，只有與時俱變的自我認同之「銘刻」。

許多關注治理性環境的理論家(治理性環境意指控制身體的場域)，並非完全仰仗傅柯的論述，而是結合了傅柯與其他理論家的洞見與方法。舉例而言，透納(Turner, 1984)的研究主要是遵循派深思·霍布斯與傅柯的論述。同樣的，巴特勒(Butler, 1993)所探討的「異性戀矩陣」(heterosexual matrix)，將身體視為性別化權力關係施展的對象與目標，這是擷取自奧斯丁(Austin)和阿圖塞(Althusser)的論述，認為個人「受到召喚」(hailed)，才會去履行特定的主體職務。儘管這些理論家都對管理身體的方式感興趣，但是不同的理論家會將分析導向不同的主題，包括性差異與「種族」差異、醫療、以及認同的展演性(例如 Diamond and Quinby, 1988; Sawicki, 1991; Case *et al.*, 1995;

Turner, 1995; Gatens, 1996; Phelan, 1997; Richardson, 2000)。然而，社會建構論的分析多半趨於一致，大多關注身體多樣性與創造性在當代的從屬地位。

雖然這些理論有效闡述了身體是如何被權力關係所治理與銘刻，但是每當談到身體何以成為社會之源，以及身體化行動的生命經驗時，這些理論卻往往保持緘默。他們多半抹煞身體在社會之外的本體存在，所以無法就制度對身體的損益效果，來評估制度本身。為因應此項缺漏，一九九〇年代興起一股研究風潮，專門探討「身體本身的身體化經驗」(the body's own experience of its embodiment)，並認為行動的機會與限制取決於「身體本身的問題」(Frank, 1991:43)。雷德(Drew Leder, 1990)強調工具理性行動的生命經驗，即可作為一例。他提出「不在場的身體」之概念，表示當我們從事有意義的行動時，身體通常會從我們的經驗中「逐漸消失」，最後「不復存在」；但是當我們生病或感到痛苦時，身體又再度成為關注的焦點。相形之下，楊格(Iris Marion Young, 1980, 1998:147-8)的女性主義現象學則強調，父權社會每天都將內在性(immanence)加諸於女性身體之上；而法蘭克(Arthur Frank, 1995)則用經驗說明身體在生病期間的重要性，藉此分析「受苦教學法」(pedagogy of suffering)如何促成一種新的人際倫理。

這些論述運用現象學、存在主義與互動論的資源，將身體描繪成社會之源。然而，對「肉體社會學」(carnal sociology)的訴求影響最鉅者，非梅洛龐蒂的現象學莫屬。「肉體社會學」的基本假設為：「『自我』、『社會』、『象徵次序』都是透過身體運作建構而成」(Crossley, 1995:43)。對梅洛龐蒂(Merleau-Ponty, 1962: 136)而言，身體化主體依據自身與周遭環境的密切關係，並透過身體化存在境況所培養而成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發展出自身的傾向和意圖。此一觀點強調身

體化的「決定性」而非「被決定性」，也強調意義與知識所共享的身體基礎，這對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構成重大挑戰。然而，儘管現象學表面上很重視「活生生的身體」，但現象學內部卻有某種矛盾存在。一般認為現象學旨在分析人們如何體驗其身體，但這項傳統其實著重於經驗本身的身體基礎。因此，誠如雷德(Leder, 1990)的研究所示，以現象學闡明人在世上的實際「經驗」時，「身體」可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然而，雷德的研究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將正常的身體視為隱蔽且消失的身體。我們可以將他的這種觀點詮釋如下：現代性中最重要的就是工具理性，雷德評述身體在工具理性的主導之下，究竟會有怎樣的命運。在此脈絡下，我們可以認為，雷德的研究喚起人們關切身體在現代性之下所逐漸喪失的重要性。就此層面而言，雷德的研究與社會建構論者有少數雷同之處。

分析井然有序的身體以及「活生生」的身體，雖然為身體研究提供各種發展路線，但這些分析其實仍複製了結構理論與能动性(agency)理論之間，存在已久且令人欲振乏力的分際(Dawe, 1970, 1979)。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就是為了克服這種對立。結構化理論的社會觀將身體置於中心位置，並基於此一假設，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彼此相互建構。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正是這種社會生活理論的重要提倡者。另一方面，葛羅茲(Elizabeth Grosz)提供我們另一種女性主義分析，探討身體與主流性慾特質規範如何相互建構。雖然這些理論家的論點不盡相同，但他們都宣稱身體不但是社會實踐的接受者，也是其社會環境的主動創造者。在布迪厄的社會再製理論中，身體受到階級不平等的影響，但同時也複製了階級不平等。人們從小習得的身體化秉性，「不斷將需要

轉化為策略，(並且)將限制轉化為偏好」(Bourdieu, 1984:190)。紀登斯(Giddens, 1991)的「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之概念，提供我們一個不同的視角，來理解身體與社會特有的社會原則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當代社會世界的偶然性被身體的偶然性所吸納與強化。葛羅茲(Grosz, 1994)指出，性別身體既有建構能力，同時亦被建構而成，這種看法也很特別。她採用麥比烏斯帶(Mobius strip)(朝內翻轉的三次元八字型)的拓樸形象(topological image)，探索身體如何為性別差異提供一個形態學的基礎。另一方面，身體又(既是從內部又是從外部)受到性別規範的銘刻力量所建構。

結構化理論提供我們一條「中間路線」，它介於社會建構論的治理性論述與現象學的「生命經驗」論述之間。簡而言之，身體是一種途徑，個人藉由身體，方能依附於社會，或與社會決裂。然而，這些選擇是否可行，仍令人存疑。布迪厄(Bourdieu, 1984:466)主張身體的秉性會持續變動，由於他認為習癖(habitus)是在潛意識層面上發揮作用，所以我們難以理解，個人會如何逃脫加諸其上的秉性軌跡。相形之下，紀登斯則著眼於流變性與反身性，他賦與身體一種「生命的不可能之輕」；所謂「生命的不可能之輕」意指永續的資源，而非脆弱且難以逃脫的存在，再者，個人及其反身性所建構的自我敘述，能夠重新創造此一「生命的不可能之輕」。最後回到葛羅茲，雖然她想找到流變的可能性，但她也強調身體的性差異；社會額外將「差異加諸於」身體的內部與外部，似乎維持了相互對立的男女認同。然而，如果將這些差異暫且擱置一旁，我們可以認為上述這些分析，皆再度引發人們對身體生產力的嚴重關切。對布迪厄、紀登斯與葛羅茲而言，身體已各自從屬於社會階級的命令、認知的反身性與性差異。

肆、理論與身體的雙重調停

社會建構論對井然有序的身體(ordered body)的分析、以行動與現象學為導向對活生生的身體(lived-body)進行研究的方法，以及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三者提供我們系統性的理論選擇，證實身體此一主題無所不在，並且賦予身體研究領域一種自我認同。這些雖然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它們相互對立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假設，終究讓身體更加難以捉摸。這些理論都需要身體，社會建構論用身體概念證明，那些所謂「自然」的自我認同，其實是社會所建構而成；現象學則用身體概念證明，身體是一切經驗發生的場域；結構化理論用身體概念證明，身體化主體吸納並積極再現社會結構。雖然這些理論各自將身體視為個體在其週遭環境的棲身之處、棲身之源、與棲身的途徑，卻沒有任何一家學說承認身體化主體囊括這三種多元意涵。身體的重要性在於，它是銘刻社會結構的場所、建構社會的手段，以及連結個體與社會的管道。然而，任何全面性的身體理論，都必須將上述三者一併納入考量。

從更建設性的角度來看，當代的主流研究方法，都設法引發人們深切關注身體化主體的意義喪失與創造性喪失，藉此對身體在現代世界中的意義發表洞見。這些研究顯示，我們必須進行實質性研究，以便評估當代社會發展是否真的會征服身體化主體。因此，一方面，古典作品的趨同性(趨於某種身體實在論)提供我們一個寶貴的架構，我們能據此對身體進行實質性研究；另一方面，我們對新近研究方法的公開關切，以及對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著作中的論據予以關注，將能有效駕

駁這些研究的方向。

伍、探索身體

本章為了釐清本研究所採用的身體實在論研究方法，因而按照各種分析目的，個別處理「身體作為組成社會之多面向媒介」的三個面向。我們不宜將這些面向，視為互斥的選擇或是完全獨立的身體「功能」，反之，這些面向構成彰顯身體自身之持續過程中的共存時刻，或該過程的諸多面向。身體實在論的優點在於，它提供我們一種分析方式，讓我們能夠接近並檢視社會自然生活之流(flux of socio-natural life)。如果我們抹煞其中一個身體面向，恐會導致各種化約論(reductionism)，而當代的主流研究取徑都深受化約論之害。從更廣的角度來看，我們若抹煞其中一個身體面向，也將造成自然主義的身體觀與社會建構論的身體觀，以致於無法就身體與社會之關係提供適切的概念(Shilling, 2003)^⑧。認識到身體是組成社會的多面向媒介，當然只是進一步研究的起點。身體作為源頭、場域與媒介的這些面向，三者間的平衡無疑會隨時間而改變，這取決於許多變因。再者，欲針對這些變因作出真正全面性的分析，則需從生

^⑧：自然主義認為生物之身體是身份認同與社會的源頭，不受社會、文化或科技因素所影響。因此，他們無法體會，身體如何作為非肉體過程的運行場域，或者，因為他們無法察覺社會環境在身體內部的互動情況，於是無法瞭解身體同時也是個體置身社會或導向社會的途徑。社會建構論者的觀點亦有缺失，不過，這是出自不同的原因。他們將身體視為空瓶，被社會決定力量所填滿或創造。他們著重身體作為場域的面向，這種研究方法卻無法體認到，身體作為社會源頭的重要性，或者，無法瞭解身體與社會的互動是人們藉以置身於或導向環境的途徑。

物學與演化論的研究，以及社會分析三方面，對身體的生成特徵進行周詳的探究。社會學家當然會考量到身體的生成特徵，除了承認它們的存在，還避免忽略其重要意義，但社會學家必然會在社會對身體的影響上著墨較多。這麼做並無不妥。只要身體實在論分析不會瓦解身體與社會之關係的物理性、物質性與生物性，它就會從社會著手，並全心投入社會研究。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瞭解，不同群體的身體會生成不同的社會，也會接納不同的社會結構。從更廣的角度來看，瞭解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對身體研究與社會理論來說一樣重要。舉例而言，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的身體，白人或黑人的身體，健全或有各種肢障的身體，成人或兒童的身體，長期以來都有不同的社會定位。接下來幾章會談到這些議題。

21 第二章與第三章將針對馬克思、涂爾幹與齊美爾的著作，建立起更為詳盡的趨同理論，並考察當代身體研究方法的各種理論，以及當代身體研究方法所共同關切的問題，以形成本書的理論基礎。在確立了身體實在論的身體觀(亦即將身體視為組成社會的多面向媒介)之論述基礎後，第四章至第八章將針對身體與各種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進行一連串的實質性分析，繼而探討新近研究的重點所在。各章將分成幾個小節，反思身體實在論所作出的區分，接著則會依序處理身體的三個面向，分別是身體作為社會之源、身體作為社會的棲身之處，以及身體作為棲身於社會的手段。本書所探討的著作皆關注身體的某些特徵，我將回顧且分析這些著作，並明確指出，這些作品皆無法完整陳述身體與社會的關係。各章最後都會詢問「當代發展是否真會馴服人類主體的能力與潛力」這個問題，藉以評估當代研究是否站得住腳。

這些討論匯集了通盤的概述與評析。本書引用近年發表的

大量身體相關研究，將之置於實在論的圖式中，並以實在論作為基礎進行分析。實在論的圖式有助於我們，對身體化主體與社會間的互動進行實質分析。各章將分別論述「勞動的身體」、「運動的身體」、「音樂的身體」、「社交的身體」以及「科技的身體」。選擇這些主題的原因在於，這些主題本身就是重要議題(尤其是音樂這個主題，長期以來都被邊緣化，這實在沒有道理)，也因為這些主題涵蓋古典理論家所關心的面向，諸如經濟/技術、文化與社會，而且那些古典理論家的作品，也有助於確立本研究所強調的趨同理論。最末，第九章將闡述本研究對日後實證研究以及近來身體理論(尤其是關注身體在西方社會之命運的研究)的重要性。過去二十年來，身體是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中極具生產性的議題，但卻致使身體研究領域益加零碎紛亂。在此脈絡下，本書的結論支持身體研究凝聚於某個單一議題，而這個議題必須能賦予身體議題更多的連貫性。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此試閱版與未來正式上市版本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 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此書在正式上市時能即時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